

浅析构建和谐世界中的中国文化外交

叶 静

(武汉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文化外交是一国为达到某种特定目的或实现某种特定战略意图,以自身文化为载体,通过政府或民间渠道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它是从属于并服务于以维护和发展国家安全利益为核心的整体外交战略的。在文化外交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新时期,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以此来指导国际关系与外交活动的方方面面。浅析了文化外交的概念,梳理了中国文化外交的历程,总结了新世纪中国文化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构建和谐世界目标下的中国文化外交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文化外交; 和谐世界; 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09)05-0067-05

Chinese Cultural Diplomacy in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World

YE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Cultural diplomacy is a kind of diplomatic activity, through government or non-governmental channels, with its own culture as the carrier, and to achieve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a particular strategic intention. It is subordinate to and serves the overall diplomatic strategy with the core of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new era when cultural diplomacy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world, in order to gu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in all aspect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diplomacy, studi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al diplomacy, summarizes Chinese cultural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in the new century, and on the basis of these, looks forward to the the prospects of Chinese cultural diplomacy in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world.

Key words cultural diplomacy; harmonious world; soft power

作为除了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之外的第四种外交方式,文化外交实践在中国古已有之,如张骞出使,玄奘求法,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但是对文化外交理论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直到进入新世纪,中国政府才把文化外交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提出来,把文化发展战略看作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文化外交提高到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同样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上来^[1]。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更深了,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传统领域的竞争也逐步

转向无形的“软实力”的对抗。在新的时期,我国在延续了一贯的和平外交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成为我国文化外交的旗帜和战略目标。

一、文化外交的定义与内涵

“文化外交”作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形态,自古有之。例如:早在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就为我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还有佛教的东传、隋唐时期日本的遣隋使、遣

唐使、入宋僧、入明僧,以及近代中国人的留学日本热潮等等,都是文化外交生动的范例。但“文化外交”作为一种概念的出现,则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当时,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尔夫·特纳(Larf Turner)首先明确提出了“文化外交”的概念。他认为“文化外交”是由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对外文化交流行为^[2]。它不是传播某一种知识,而是一种完整的价值观,是集思想和观念为一体的外交。通过“文化外交”,一国政府可以影响他国民众心态和他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从而输出一种文化价值观及其信仰。

但是,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对于“文化外交”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或侧重点。有人认为,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3];也有人认为:“文化外交就是围绕国家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间公关活动。”^[4]不论如何定义,所谓“文化外交”,应该是一国为达到某种特定目的或实现某种特定战略意图,以自身文化为载体,通过政府或民间渠道而展开的外交活动。它是从属于并服务于以维护和发展国家安全利益为核心的整体外交战略的。

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日趋深入,国与国之间的全方位竞争愈加激烈,一国能否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主角,文化外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为权利与和平而斗争》中指出,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控制分为三个方面,即政治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妙的,如果他曾单独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一定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它的目的不是政府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利关系的手段^[5]。20 世纪 90 年代,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了著名的“软实力”理论,在 1990 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和一本专著《世界权利的变革》、《软实力》和《必定要领导:正在变化着的美国权利的性质》中最早阐述了关于软权力的理论。他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除了物质力量之外精神、行为等力量的总和,包括价值标准(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及

其运行体制)和西方文明(文化、宗教等影响)。具体地说,软实力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国际声望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软权力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权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权力”,它具有相互性、扩散性、共享性、渗透性等特点。历史证明,能在国际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历来是两种实力兼备的国家^[6]。“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把文化因素提到国际关系的核心位置上,认为:“世界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国际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也不再是经济上的,而是文化上的。”^[7]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文化外交走到国际政治的前台奠定了基础,从此国家对文化外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二、我国文化外交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外交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历朝政府都很重视文化外交的开展。例如:汉代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汉唐高僧西游印度取经,东渡日本传道;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到了近现代,黄遵宪从事中日文化交流;1930 年梅兰芳的赴美京剧演出等等,中国正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从未中断。这些文化交流活动对于宣扬中国文化、扩大国际影响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通过与其他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使中国优秀的文化成果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传递了中华民族珍视友谊、乐于交流、崇尚和平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非常重视文化交流的作用。在党和政府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发展与各国之间的文化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并在 20 世纪 50 年代明确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积极发挥文化外交无疑是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以对外文化交流形式出现的文化外交当时已经成为国家整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使用各种途径与其他国家展开积极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塑造了中国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新形象。这一阶段中国的对外交往主要集中在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中国和多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协定,并派

代表团和艺术团出国访问和演出。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当时,中国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派出留学生及各种交流人员达数万人。中国的一些艺术作品,如电影、广播节目、杂技、歌舞、戏剧和文学作品等也先后出国展示,受到热烈欢迎。同时,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外交封锁与包围,我国政府积极采用文化交流的手段来促进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英、中法及中日关系就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例如:1956年以著名京剧家梅兰芳为团长的中国京剧团访日,揭开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序幕。即使对于当时处于长期对立的中美关系上,文化外交也起到了“破冰”的作用。中美双方通过所谓的“乒乓外交”改变了相互封闭与对抗的局面,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铺平了道路。中国的文化外交为新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使是在象“文化大革命”这样困难的时期,中国也没有中断对外的文化交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化步伐加快,综合国力不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并深化。根据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邓小平及时提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并对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做出了调整,改变了过去以社会制度划分阵线或以价值观念定亲疏的做法,确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8]。发展文化关系就是通过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一切对我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东西,为我国与各国人民的繁荣、幸福与进步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服务。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与美国亲自签订了《中美文化交流协定》。通过文化交流这一较易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方式,加强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相互沟通与了解,促进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此后,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开始进入空前活跃时期,文化外交的内容也多种多样。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0年,中国与外国共签订了79个文化合作协定。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总特征。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开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越来越走向相互依存,国与国之间逐步由政治、经济、军事等传统领域的竞争转向无

形的、较少强制性和危险性的、低成本而又高效能的“软实力”对抗。而文化正是这种“软实力”的核心。文化外交不仅作为节省成本的外交手段被越来越倚重,而且文化外交还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不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时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出于国际战略利益考虑,在世界上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为了反击这一宣传攻势,中国充分利用文化外交这一方式,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和为贵”的文化伦理及“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取得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充分认识到文化外交的重要性,提出了明确的文化建设及发展规划。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总书记就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9]以文化交流的形式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当代中国的伟大形象,从而为对外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是这一时期文化外交的主要任务。

三、现状与展望:构建和谐世界中的文化外交

1. 构建和谐世界目标的提出

在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最值得称道、最能为今日国际关系和外交所借鉴的就是源自“和合”思想的和平外交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中就已经出现。“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最早的文献中就有关于和谐的思想,如《尚书》中有“协和万邦”的词句。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都主张和谐,和睦。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0]即强调多样性统一,表现了重和趋同的价值取向。老子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1]的思想。《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2]中和、和为贵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体现了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一个愿望——和谐。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自我修养,还是一般世事,和谐都是关键。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处处体现“和合”的文化

传统,无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理论,都是“和合”文化的表征。而“和谐世界”的理念与此一脉相承,并把这一外交文化推向了顶峰。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拓展了全新的国际视野和国际身份。如何解决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需要我们加快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搞好软实力的建设。中华文化可以成为中国增强实力的宝贵的软权力资源。在此背景下,和谐世界理念应运而生。它是中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是我国和平外交思想的发展。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建设和谐世界理念,通过追求公正与平等、包容与民主,通过对话与合作、和平与发展,以实现人自身身心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与繁荣发展^[13]。2006年元旦胡锦涛主席的新年贺词倡议“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向世界传达了我国追求和谐世界的崇高思想,成为了我国政府的外交宣言,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好评。

2. 和谐世界目标下的中国文化外交

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矛盾斗争依然深刻复杂,局部战争不断,仅靠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外交的方式并不能完全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目标。理解了“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我们不难看出,文化外交在新的时代更能体现出它的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它在对外关系中常常起到其他外交手段不能达到的战略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文化外交手段,深入阐述我国和平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世界等治国理念和内外方针,努力增进各国民众对我国内外政策的了解和支持,进行了一系列淡化政治色彩的柔性平等的文化外交,如展览、展会、演讲、教育等,主办“文化年”、“文化节”等对外文化活动,建立“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在文化外交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2003—2005年,历时两年、覆盖两国全境、先后举办700余场活动、被誉为“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的创举”的中法文化年的成功举办是中国政府在世纪之初进行文化外交的典范。历时7个月、覆盖非洲22个国家的2004年“中华文化非洲行”是中国文化外交史中的又一盛事。2005年在华盛顿揭幕的“中国

文化节”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称之为“艺术中心历史上最大胆,投入最多的国际文化合作项目,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14]。2006年、2007年,中俄两国成功互办“国家年”,2006年在中国举办了“俄罗斯文化节”,俄方选派了22个演出团体和6个艺术展览来华交流;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了“中国文化年”,中国选派了14个演出项目和7个展览项目赴俄交流。直接参与的民众超过百万人次。中俄文化交流使两国民众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加深了彼此间的尊重和友谊,为中俄两国关系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通过绚丽的艺术手段,满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发展的社会动力和价值观。中国还将在2010年举办亚运会和世博会,意大利也将在2010年举办“中国文化年”,中国必将利用这些契机,更多的用文化语言向世界展现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思想。

中国有着许多具有传统特色的手工艺品(如年画、风筝)、古典音乐(如古筝、二胡)、中国医学(如针灸、中药)、中国戏剧(如京剧、黄梅戏)、中国服饰(如旗袍、唐装)、中国功夫(如气功、太极拳)等,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展览、展示、演出、文体活动的方式把中国几千年的勤劳智慧的结晶传播于世人。

这些文化活动的成功举办引起了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关注与称赞,中国文化的热潮在西方国家也因此迅速升温。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已有百余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40多个国家,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孔子学院是在借鉴国外有关机构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它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宗旨。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热”是中华文明恒久魅力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充分体现。它说明世界在用积极、善意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关心着中国;“中国热”还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良好契机。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文化外交上,虽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的文化外交政策尚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发达国家

相比,中国的文化产业还很弱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8 世界经济创意报告》提供的数字显示,2005年,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量占全球市场总额的19%,中国已成长为文化产品最大的出口国。但如果联系起当下版权贸易5:1的赤字状况,我国文化产业在全球的地位现状是:复制能力强大,但原创能力不高。文化部部长蔡武近日称,当前我国文化产业领域普遍呈“小、弱、散”状况,大量呈现“为他人做嫁衣”的“纽扣现象”^[15]。西方文化以产业形态对中国的殖民化,构成了现实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整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实行国家产业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制定国家文化产业战略,构建中国的文化产业体系,与西方文化及其商品形态大举入侵中国市场的力量抗衡,达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发展文化产业和提高经济实力的目的。

21世纪的外交不是一场硝烟战火的外交,而是一场“和平环境”下的“和平外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国际影响力是我国重要的软实力。制度、文化、外交(行为)三位一体,紧密联系,社会制度是核心,文化是支撑,外交是手段,构成了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强大力量,对当前国际舞台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未来,我们要积极利用各种手段来推行我们的和平、和睦、和谐的文化外交思想。我们要加大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在保护好中华民族优秀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大力推动文化创新,使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信息时代相结合,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其更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我们要加强国际文化交流,面向世界、广收博采,文化多样性是和谐世界的基石,我们要吸收异质文化的精华,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使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共存、互动、平等对话,永葆旺盛的生命力。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大众传媒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输出和观念渗透已经成为国家力争扩大对外吸引力的重要方式。我们要利用各种传播技术和传播工具,如报刊、图书、电影、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用不同的文字和语言向世界介绍中国,大面积、高强度地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我们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作

为一种文化外交理念去指引21世纪我国的对外关系。我们要让世界知道,中国是利用文化手段来宣传中国,通过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理解世界,认清中国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只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并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6]

参 考 文 献

- [1] 唐家璇. 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J]. 求是, 2004(23): 3-6.
- [2] 李智. 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
- [3] 李智. 试论文化外交[J]. 外交学院学报, 2003(1): 83-87.
- [4] 孟晓骝. 中国: 文化外交显魅力[N]. 人民日报, 2005-11-11(7).
- [5] [美]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利与和平而斗争[M]. 杨岐鸣, 王燕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90.
- [6] JOESPH S N.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90: 31-34.
- [7]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J].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22.
- [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44.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37.
- [10] 钱逊. 论语读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64, 239.
- [11] 范永胜. 老子[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5: 58.
- [12] 王国轩. 大学·中庸[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01.
- [13] 胡锦涛. 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EB/OL]. (2005-09-16) [2009-09-10].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9/16/content_3496858.htm.
- [14] 刘水明, 王小光. 文化外交 彰显魅力——文化部长孙家正畅谈今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N]. 人民日报, 2005-12-19(7).
- [15] 陈家兴. 我们失去文化创造力了吗? [N]. 人民日报, 2009-06-16(5).
- [16] 温家宝. 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EB/OL]. (2009-03-05) [2009-09-10].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9-03/05/content_10948325.htm.

(责任编辑: 陈万红)